

“一门三将”与保定

□王金生



王伯骏(右)和王伯骅(左)阔别63年后高龄重聚于香港。

我祖籍河南禹州,父亲王伯骏是河北省立医院的创建人,与他的兄弟享有“一门三将”的美誉。而父辈们的抗战生涯是从保定开始的,抗战胜利后又回到保定,可谓与保定有缘。

七七事变后,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奉命驰援北平进驻保定,是进入华北的第一支中国军队,官兵抱着必死的决心纷纷给父母妻儿写信诀别。我

大伯王伯骅时任26路军30师少将参谋长,四叔王伯骐任30师中校军需主任,六叔王伯骅任26路军31师上尉警卫连长。日军不费一枪占领东北又轻易占领了北平、天津,26路军迅即向永定河推进,王伯骅、王伯骐所在的30师进守房山,王伯骅所在的31师进守明顶山,成为中日首次会战涿州保定大会战的中方主力,大战50天,迫使日军第一次付出阵亡1488人的代价才进入涿州,力挫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气焰。

之后,三位父辈经历了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鄂西会战等一系列大战。尤其是徐州会战,六叔王伯骅九死一生,始终据守在台儿庄大战的中心,战后升任30军31师93旅185团第二营少校营长。大伯王伯骅武汉会战调任30军27师少将参谋长,豫南会战任27师副师长,鄂西会战后调四川三台任潼潼师管区少将司令。六叔王伯骅则继续随30军参加了常德会战,晋升中校副团长,抗战胜利后晋升师长。

在日本留学的父亲王伯骏自抗战全面爆发后即回国投身抗战,第一份抗战职位即是在日机重点轰炸下的汉阳兵工厂任上校外科主任,历任广西潯州省立医院外科主任、军政部第11重伤医院上校外科主任、抗战乐西公路第三卫生总站主任、军医署驻第一重伤医院上校甲级专科医师、第六战

区巡回外科手术上校甲级专科医师。大伯王伯骅时任27师代师长,率部两天三夜700里增援鄂西会战,又调四川三台任潼潼师管区少将司令,途经父亲王伯骏的任所附近,弟兄意外相遇,战中一别已6年未卜生死。

之后父亲王伯骏晋升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将军的少将私人医师。孙将军夫妇设家宴迎接我父母时间及王伯骅,闻知其豫南会战后已解甲还乡,孙将军赞其工作兢兢业业,连称可惜。接着,大伯王伯骅晋升兵役部督察处中将处长。日本投降,第六战区改11战区,父亲随孙连仲将军飞北平在故宫太和殿出席华北日军受降仪式,接收日特医院,创建河北省立医院并任院长,迅速组建各科室人马,向保定救济院捐款,颁布含有“赤贫民众免费”的省立医院收费办法。大伯王伯骅由兵役部调11战区也来到北平,历任河北省善后救济总署主任、河北省征募委员会主任、沧州专员兼津沧绥靖区中将司令,继又受国防部委派驻保定绥靖公署。

我的父辈弟兄当年驰援北平抗战,从保定开始,行经冀、晋、苏、川、渝、康、豫、鄂、皖、湘,至抗战胜利又回到保定。祖父王度彰晚清于保定莲池书院求学,又曾在保定高师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教授文史。我的明朝先祖王述古和王则古中进士后一位曾任保定府知府,一位曾任雄县知县,祖上与保定堪称渊源深厚。

我当民兵连长

□郭振山

1975年1月,我高中毕业回村不久被任命为村团支部书记。当时的惯例是由团支部书记兼任村民兵连副连长,由于担任连长的村党支部副书记年老有病,民兵连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我负全责。

之后不久,在肃宁县武装部当部长的本家哥郭汉臣回来过年,听说我当了民兵副连长后找到我,问我们有什么训练计划。我当时刚走出校门不久,对村里的各项工作还不适应,更别谈民兵连的训练工作了。郭汉臣一听就急了,对着我就是一番严厉的批评。

他说这哪行啊!民兵是我国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时是民,战时是兵,一旦战争起来,你怎么能拉着一支没有训练的队伍上前线呀!这不是拿着民兵们的生命开玩笑吗?他说完见我不知所措,又说:这样吧,今天晚上你把基干民兵召集到大队部集合,我来给你们上一课。

当晚我按照花名册刚把全村30多名基干民兵召集起来,一身军装的郭汉臣就到了。一见我们一盘散沙的样子,他十分生气,命令我们排队站好,然后站在台阶上从站姿开始进行队列训练,稍息、立正、举手、投足、踢腿、甩臂、跑步、正步,全幅标准的军人姿势。半小时后,看看大伙都累了,他便把我们集合到室内,教我们唱《民兵之歌》:“说打就打,说练就练,练一练手中抢刺刀手榴弹。瞄得准来投弹投得远,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胆寒。抓紧时间加油练,练好本领准备战。不打垮反动派不是好汉,打一个样儿叫他看一看。一二三四……”

大家都是年轻人,平时也没什么事,突然有人带领我们开展活动,大家热情都很高,不一会儿就都会唱了。第二天正是除夕,晚饭后大队的大喇叭里突然传出郭汉臣的声音,要全大队的基干民兵10分钟内到大队部集合。听到广播后我匆匆赶到大队部,郭汉臣一边看着手表一边数着到达的人数。10分钟时间一到,他便不再等待,让我集合好已到的人数。他简单地说了下训练项目,即5公里越野跑,起点是大队部,出门沿大街向东,过东各堡、北河俩村后顺安望路北行至北河村北,沿机耕道西行经东各堡村北返回,全程大致5公里。提出几点要求和注意事项后,他便跑到队伍前头,让我下令起步,带着大家一路小跑而去。说真的,这是我

大队民兵连成立以来在和平年代举行的第一次拉练,大家感到好奇的同时也尽着最大的努力保持队形。行进中郭汉臣不时地停下来为掉队者鼓劲,然后再紧跑几步回到领头的位置领跑。

此后,每天下午他便组织大家在村南五队场上进行踏步、正步、投弹、刺杀训练,晚饭过后带着我们跑5公里拉练,只有大年初一例外。不觉7天过去了,郭汉臣归队前一天来到我家,帮助我对全大队在册民兵进行了统一编排分班,将全大队97名民兵分成三个排,每个排又分成三个班,由参加训练的基干民兵分任班排干部,形成了符合战争要求的指挥体系。

这以后,我们大队的民兵训练一直坚持了下来,除日常训练外,每到初秋地里的庄稼相继成熟时,基干民兵便担负起护秋任务,冬天农闲时尤其是一进腊月便又担负起晚上巡逻、防火防盗、保护社员安全的任务,多次受到公社和县武装部的表彰。

5年后我上大学迁出户口,我的大队民兵副连长职务自然解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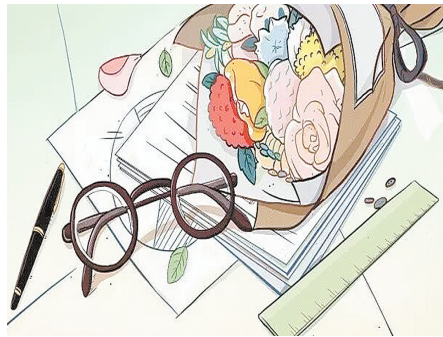
“赶考”得中忆师情

□郑理

1948年我去县城考高小,那时一至四年级为初小,五、六年级为高小,由初小升高小要经过考试,有高小的学校称完小,全名为完全小学。完小一般设在城镇,县城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教育资源优于乡、镇,所以一到招生,许多农村的学生都到县城去“赶考”。

我们村一共去了4个学生,考完后回家等着发榜。等的这几天真是不好过,晚上睡觉做梦,没考上哭醒,考上了笑醒。到了发榜的日子去看榜,那时的榜按考试成绩排名次,在每个人的姓名上都点一红点,最后一名下边勾一个“乙”字,就是人们常说的谁谁坐了“椅子”,又称“背榜”。

看榜时,我先从后往前看,心想,不管前后,考个背榜也不怕,只要考上就行。快看完了还没有我的名字,这时头有点发胀,口发干,鼓着勇气再往下看,突然眼睛一亮,居然在第一行发现了我的名字,考了个第四,我们4个同学考上了两个。我按捺着兴奋的心情,尽量不喜形于色,一是怕人说得意忘形,二是也怕落榜的同学受刺激。



之所以能够在县城的完小考个第四名,全得益于我上初小时最后一位老师。1947年,我们村来了一位老师,姓陈名竹溪。这位老师长相一般,穿着一身布衣服,但举止潇洒,气度不凡。那时村里正进行土地改革,为动员青年参军搞宣传工作。村干部请陈老师帮助写标语,他慨然应允,手拿麻刷子,沾着石灰浆,不打格也不画线,大笔一挥而就,字写得又肉头又有筋骨,把村里的人都镇了,都夸陈老师一手好颜柳串。陈老师不仅字写得好,吹拉弹唱样样都行,他带来月琴、二胡,白天教书,晚上组织学生开展文艺活动,排演了《婆媳俩》《防空洞》《兄妹开荒》等话剧、歌剧,他还在《兄妹开荒》中扮演了哥哥。一个沉寂的小村很快活跃了起来,白天是朗朗读书声,晚上传出悠扬的歌声、管弦声。

当时小学读物非常缺少,陈老师从家里带来了《论说精华》《尺牍》。他讲其中的“说牛”,鼓励我们学习要有牛那样的韧劲。初小的算术课本只学到带括号的数学题,陈老师从家里拿来一本不知什么年代初版的《算学》。现在的算术试题是横列,阿拉伯数字,这本《算学》是竖列,一二三四五,数字用汉字表示,他用这本书给我们加了“行程”“和、差”“鸡兔同笼”等整数四则杂题。我考得好就是沾了这本《算学》的光,考卷上的试题我们都在这个课本上学过,所以很轻松地完成了答卷。我想我的算术极有可能得了满分,否则考不上第四名。

陈老师教学认真,对学生和蔼可亲,那时学校教育还有封建残余,但他从不体罚学生。他不叫学生学名,直呼乳名,亲如父兄。